

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史论

沈松勤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史论 / 沈松勤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7-5325-8740-7

I. ①明… II. ①沈… III. ①词(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2799 号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

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史论

沈松勤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6.375 插页 5 字数 396,000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

ISBN 978-7-5325-8740-7

I·3244 定价: 7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目 录

绪 论	1
一、选题的缘起	1
二、中兴的标志	9
三、主要框架与内容	21

上编 词 史

第一章 “仿佛乎两宋之盛”

——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及其词史意义

一、词人群体的崛起	34
二、“变徵之音”的骤起	44
三、中兴的词史意义	63

第二章 从“蓓蕾初放”到“烂漫极矣”

——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历程

一、词体体制意识的自觉期	71
二、多元格局的建构期	79
三、“正”“变”辉映的鼎盛期	87
四、中兴以后的词坛走势	94

第三章 在唱和中“逼出妙思”

——明清之际词坛中兴的运行模式	105
一、引言	105
二、唱和概况	108
三、唱和与“同人”情感的共鸣	112
四、唱和引领词风新变	129
五、结论	139

中编 词 派

第四章 重启诗化“变调”

——柳洲词派的词学主张与创作成就	145
一、《柳洲词选》与柳洲词派	146
二、柳洲词派的词学主张	153
三、柳洲词派的创作风格	160
四、柳洲词派的中兴地位	179

第五章 重振风雅“正声”

——云间词派的创作及其影响	188
一、引言	188
二、云间词派的形成	190
三、云间词派的词学主张及其创作	198

四、云间词派的词坛影响	209
第六章 “正”“变”兼善	
——阳羨词派的理论贡献及其词史地位	226
一、引言	226
二、《荆溪词初集》与阳羨词派	228
三、阳羨词派的理论贡献	236
四、阳羨词派的历史地位	248
第七章 从梅里走向浙西	
——浙西词派的形成与词坛转型	266
一、引言	266
二、梅里词人群与浙西词派	269
三、浙西词派的词学主张	283
四、浙西词派与词坛转型	296
五、馀论	309

下 编 词 学

第八章 从词集到词论	
——明清之际的词学建构	313
一、引言	313
二、词集	315
三、词谱	341
四、词论	355

第九章 选学的兴盛

——词选的功能与作用 388

一、引言 388

二、在立论中转移词坛风气 390

三、在史、论并举中引导词坛中兴 401

四、郡邑词选与词坛中兴发祥史 415

第十章 评点的盛行

——词集评点的意义与价值 431

一、引言 431

二、词集评点的动因 434

三、词集评点的理论意义 441

四、词集评点的认识价值 449

附录一 曹尔堪《京华词》 461

附录二 明清之际词坛年表 472

引用书目 499

后 记 517

绪 论

一、选题的缘起

词始于唐而盛于宋。较诸诗歌，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无疑是一种“年轻”的文体；而真正作为具有系统性的一门学科，与传统诗学相比，词学则更显稚嫩。不过，近代以来，“诗有史，词亦有史”^①，已成为词学界的共识；词史研究作为词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引起了词学研究的高度重视，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尤其在当代，无论数量，抑或质量，均不让诗史研究专美于前。

综观近代以来词史研究，角度不同，对象不一，内容甚为丰富。有词史的“内部”研究，其中或从词人生平、时代背景、创作内容、艺术风格、演进历程等方面，条理词的历史，或从词源、词

^①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2册，第1630页。按：周济此言意谓词与诗一样，也能反映当下社会历史，近代以来，则借以指词的发展历史。又按：所引文献作者，整理者、出版单位、出版或刊刻年月、版本等，首次出注后，只注书名，卷次，册号、页数。

体、词调、词派、词论、词籍、词学等要素，总结词的演进历程；也有词史的“外部”研究，关注词的原生态，探讨其生成、发展、演变过程中的种种外部因素（如地理环境、风尚习俗、乐工歌伎）所起的作用。有断代史，如《宋词研究》（胡云翼著，中华书局，1926年）、《宋词通论》（薛砺若著，开明书店，1937年）、《唐宋词通论》（吴熊和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唐宋词史》（杨海明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唐宋词流派史》（刘扬忠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唐宋词史论》（王兆鹏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唐五代词史论稿》（刘尊明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宋词研究·唐五代北宋篇》（村上哲见著，日本创文社，1979年）、《宋词研究·南宋篇》（村上哲见著，日本创文社，2006年）、《南宋词研究》（王伟勇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北宋词史》（陶尔夫、诸葛忆兵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南宋词史》（陶尔夫、刘敬圻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金元词论稿》（赵维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金元词通论》（陶然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宋金词论稿》（刘锋焘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金元词史》（黄兆汉著，台湾学生书局，2016年）、《明词史》（张仲谋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清词史》（严迪昌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清代词学的建构》（张宏生著，凤凰出版社，1998年）、《清词的传承与开拓》（沙先一、张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也有通史，如《词史》（刘毓盘著，群众图书公司，1931年）、《词学通论》（吴梅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中国词史略》（胡云翼著，大陆书局，1933年）、《中国词史》（黄拔荆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从数量观之，这些成果所书写的对象大多为唐宋词的历史，讨论金、元、明、清词史

的则相对偏少，但词史研究日趋丰富与全面，已蔚为大观，却是不争之事实。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词史研究的“大厦”业已竣工，只剩下内部装修的工程而已，而是词史这座“大厦”的设计观念，以及现有的“框架结构”，均有进一步思考与调整的 necessity。

如果进一步观察现有诸多词史研究的成果，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断代史，还是通史，无论词史的“内部”研究，还是词史的“外部”研究，通常是以政治上的朝代史统帅与规划建构的，将词的发展史依附于王朝的兴替史。对此，不妨称之为“朝代词史观”。在这一词史观的指导下，或带来了诸多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或存在某些有碍认识词史本来面貌的缺憾。

譬如，造成了对跨朝代词人、尤其是对取得显著成就的跨朝代词人的不必要的“割裂”与“争夺”，宋元之际的张炎就是其中的一个显例。唐宋词史或南宋词史的研究者，往往将他作为宋词的殿军，而元词史的研究者则视之为元词的开山鼻祖。为了解决这种“争夺”，洛地先生便撰文指出：“说张炎是宋人不如说他是元人。”其依据主要有二：其一，“张炎现存的全部词作……共三百零一首，可以说都是他四十五岁以后的作品，写于宋代的，一首都没有”；其二，“张炎同时代的、他的一些词友如仇远、赵孟頫等不是一向称他们是元人”^①。倘若以此为标准，历来被视作“金词”大家的元好问，其朝代归属恐怕同样值得商榷。据狄宝心《元好问年谱新编》统计，元好问现存近400首词作中，可以确定创作于金亡前的作品仅100首，绝大多数为入元后二十多年间所作，而且其晚年更有北觐忽必烈之举。据此，我们也有相当的理由将元好问纳入元代

^① 《张炎是宋词人还是元词人》，《光明日报》1983年4月5日第3版。

词人的行列之中。暂且不论张炎属于“南宋词人”抑或“元代词人”，也不论现存张炎词是否均作于其“四十五岁以后”，就张炎的词学观念而言，他 30 岁入元之前，深受姜夔、杨缵等人的影响，却是事实；词风上与姜夔也多有相通之处，后世归为“典雅”或“醇雅”一派而并称“姜张”；与此同时，在宋亡之际，张炎又与词友王沂孙、周密、唐钰等人以“龙涎香”“白莲”“蝉”“莼”“蟹”为题相唱和，寄托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自我标示了“宋人”的身份。洛地先生的文章从张炎填词的起始年代，确定张炎为元代词人，看似入理却证据不足，难以得到学界的认同，但其辨别张炎的朝代归属，目的就是为“元词”历史的书写“争夺”一个重要的个体史实，而指导这一辨别的，则恰恰是学界所普遍遵循的“朝代词史观”。

为了避免上述问题，近年来学界又提出了“遗民词”的概念（如南宋“遗民词”研究、明代“遗民词”研究），将像张炎那样在易代后不仕的词人，归为“遗民词人群”。从政治层面观之，在中国古代，遗民的确是一个客观存在，将遗民作为一个群体，考察其词创作，未尝不可，也是群体研究的应有之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元初，还是清初，遗民中半推半就陆续出仕为官吏者并不在少数，在对故朝的思念以及对新朝态度的转变上，他们与一般士人并无多大差异：元初政治上大一统后，南人北上与北人南游几成常态，客观上也促进了南北词坛的交流与融合，于同一时空中共同谱写了一段水乳交融的词史；在清初，终身为遗民的词人冒襄将其所得的包括贰臣词人龚鼎孳在内的书信及诗词文哀为一集，名《同人集》，则又明显将多种具有不同政治身份的作者视为一个在情感上共命运的“同人”群体；顺治政权入主中原后，故明诸王所建立的小朝廷在南方虽然苟延残喘了近二十年，但南北文人的“词

心”却大体相同，清初涌现的不少词选如《倚声初集》《东白堂词选初集》《瑶华集》等，便通过传人、存词、谱史，融这一时空中的南人与北人、遗民与入清后先后入仕者的词作于一炉，展示了明末清初完整而不可割裂的词坛风貌与创作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将遗民所作之词抽离出来，与同时空的非遗民词对立起来，进行单独研究，则不免支离词史之嫌。究其原因，是“朝代词史观”的一种翻版。

如果说，有的学者视张炎为“宋人”，有的学者将张炎划为“元人”，是“朝代词史观”驱使下所进行的个体“割裂”与“争夺”，那么，“遗民词”的命名与研究，则是在同一词史观念驱使下所展开的群体“割裂”与“争夺”。

这种割裂同一时空的词史之现象，还典型地体现在南宋、金、元词史的书写上。就政治上的王朝而言，这一时期南北对立，南方为赵宋政权，北方先后有金朝与元朝。本应互为交通、相互一体的南宋词与金、元词史研究，在“朝代词史观”的作用下，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老死不相往来”。研究唐宋或南宋词史者，不及“金元词”；书写“金元词”史者，不及“南宋词”。近代况周颐《蕙风词话》就以“宋金词不同”为题略作探究。1991年，刘扬忠先生据况氏的思路，撰文指出：“认真地探讨和阐明金代文学的这种独特性，并将它与南宋文学进行对比研究”，从而“写出一部金词发展史”^①。该文得到了学界的响应，《金元词论稿》《金元词通论》《宋金词论稿》等专著接踵而至，弥补了以往金、元词史研究的不足。其中刘锋焘先生《宋金词论稿》中，除《论苏轼的词学思想》

① 刘扬忠《从〈蕙风词话〉看金词发展的几个问题》，《阴山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历史的交替、词史的延续——论金代初期词的承继关系》二文涉及北宋词与金词关系外，其余篇章均就“宋词”论“宋词”，就“金词”论“金词”。赵维江先生《金元词论稿》、陶然先生《金元词通论》二著，也未将能南宋、金、元词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而是停留在“探讨和阐明金代文学的这种独特性”上。以上三著虽在金、元词的“独特性”方面的研究，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正如由宋入元的家铉翁所说：“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之外，皆中州也。”^①用今天的话来说，政治上的朝代虽然相继存在两个或三个中国，在文化上却无疑属于一个中国。这个文化中国共同继承与发展着前代的文化遗产，也有着互为一体的词史。如元好问是“稼轩风”在北方的杰出张扬者；或以传统的“体派”观念衡量，元好问无疑是“辛派词”在金、元之际的一员主将。可是，在根深蒂固的“朝代词史观”的驱使下，南宋和金、元这个南北同一文化时空中形成的词史，却被人为地割裂开来，并在对南北词坛的评价中，不乏厚此薄彼之嫌，影响了对这段词史的整体认识与评价。对此，虽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时期词的整体发展历史，并呼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②，但至今尚未有全面深入的展开。

事实表明，有意无意地将唐宋以来词的发展史纳入各个朝代的兴替史中进行建构，已成为一种习惯性的思维与定式，而且不惟词史，对于其他文学样式的发展历史的书写，也不例外。说“无意”，

① 家铉翁《题中州诗集后》，见《全宋文》，第39册，第112页。

② 详见方智范《金元词论：批评的两个走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5期）；胡传志《稼轩师承关系与词学渊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赵维江《论12至13世纪南北词坛的不同走向与互动关系》（《新宋学》第一辑）与《南北分合与元词走向》（《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是因为断代文学史的建构，既然以政治上的朝代命名，在框架上也就不受受制于朝代的兴替史；说“有意”，是指在这一框架背后，深深蕴藏着自觉的、习以为然的一种文学史观，以及在这种文学史观下形成的文体价值判断与文学史实判断。钱仲联先生说：

词至于清，生命力还旺盛，光芒还是万丈，并不像一代有一代文学论者断言宋词莫之能继。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所以有清词中兴之论。何止中兴，且又胜之。文廷式以为词之境界至清方开拓，朱祖谋以为清词独创之处，虽宋人亦未必能及（俱见叶恭绰《全清词钞序》）。文、朱二家，是清末词坛尊宿，其论断如此，无疑犁然有当于人心。^①

就广义而言，从“一代有一代之胜”演绎而来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所指为每一朝代均有其反映本朝历史、体现特定时代精神的文学，是一种大“朝代文学史观”；就狭义而言，自金、元学者至王国维反复张扬“一代有一代之胜”或“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内涵（包括“诗亡于宋而遁于词，词亡于元而遁于曲”^②在内的“文体代兴”论），是建立在文体价值判断之上的一种文学史实判断。无论广义，抑或狭义，“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成了包括词史在内的“朝代文学史观”最具理论色彩的一种经典性表述，被近代以来文学史研究者奉为圭臬，并自觉地用来指导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建构和书写。钱仲联先生以梁启超、文廷式、朱祖谋三家的观点为依据，一反其文体上的价值判断，不仅认同词至清代而中兴，甚至还

① 钱仲联《清词三百首前言》，《清词三百首》，第8—9页。

② 焦循《与欧阳制美论诗书》，《雕菰集》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本。

认为较诸“宋词”，“清词”“何止中兴，且又胜之”，为唐宋以来词史的书写作出了警示，提供了指南，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可是，这一“清词中兴”史观又朝着政治上的朝代方向，自觉地回归到了“朝代文学史观”的牢笼之中。其实，继两宋以后词坛的再盛之旅，在明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便已开启，至康熙三十年（1679）前后，降下了中兴之盛的帷幕。关于这一点，清人和当近代学者多有论述（详见本书第二章《从“蓓蕾初放”到“烂漫极矣”——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历程》）。然而，当代词学界在对明清两代历时近六百年的词史的认识与具体建构中，依然是“明词”归“明词”，“清词”归“清词”，习惯性地以政治上的朝代史割裂了明清之际这段相对独立和完整的中兴历史；与此同时，在“清词中兴”的词史观念的作用下，又忽略了“清词”在康熙中叶以后开始出现的、为时不短的停滞不前的史实。

不过，在古代，不以朝代论文学者，也不乏其人。如袁枚《答施兰垞论诗书》说：

夫诗，无所谓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国号耳，与诗无与也。诗者，各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敌，是子之胸中有已亡之国号，而无自得之性情，于诗之本旨已失矣。^①

袁枚认为，唐与宋仅仅是两个“国号”即两个朝代的名称，与基于“人之性情”的唐诗与宋诗的“本旨”无关。扩而言之，整个文学发展史也不能与朝代兴替史划等号，否则便有违基于“人之性

^① 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卷一七，第1506页。

情”的文学“本旨”与文学史的本来面貌，因为以政治上的朝代兴替史作为艺术上的文学发展史建构的框架，往往容易使人过分夸大文学的外部影响，而忽视文学作为独立个体的自身发展规律，总不免削文学自身之“足”而适朝代外在之“履”的嫌疑。事实上，在“朝代文学史观”的驱使下，这种削足适履已成了文学史书写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或既成事实。

当然，文学史书写不能惟朝代的兴衰历史马首是瞻，并不等于说彻底放弃朝代历史的考察视角，因为文学的发展从来就是文体内部传统与外部因素互为关联、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存在一种纯粹的、封闭的、孤立的发展历史。我们承认“文变染乎世情”——每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学术、文化，以及由这些诸多因素孕育而成的风尚习俗、价值取向、时代精神，对创作主体及各种文体的创作具有深刻的影响，但同时不能不注意文学的“新”与“旧”、兴与衰，并非像政治上的朝代戛然而止、即时而起那样直接明了，它在受外部影响的同时，自身的秉性毕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作为文学的样式之一，词当然也不例外。

综观唐宋以来词的发展历史，如果突破目前“朝代词史观”，以词的自身规律为主，结合其外部影响，尚可进行一番重构。重构的目的在于还词史的本来面貌。有鉴于此，笔者选择了明清之际近一个世纪词坛中兴史这一论题，通过对这段词史的考察，为重构中国词史提供应有的借鉴。

二、中兴的标志

“明清之际”原本指新旧政权更替之际，属于政治上的一个朝代概念，但从多个文化层面观之，却是难以割裂的一个完整时空。

梁启超在解释他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说：“为什么题目不叫做清代学术史呢？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①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作于明崇祯年间，因事未竟，延至清康熙初年完成。作为文化的另一层面，词也始兴于晚明。那么在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大约起讫于何时？中兴的标志何在？

所谓“中兴”，当然是相对“中衰”而言。“明词中衰，清词中兴”，是长期以来普遍流行的观念。不过，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明词的评价渐趋全面和客观。如张仲谋先生《明词史》专设《明词的中兴期》一章，认为弘治（1488—1505）至嘉靖（1522—1566）词坛，有杨慎、夏言、陈霆、陈铎、张縠等词家，他们的创作推动了词的发展；并认为这一时期可称为明词“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词坛“中兴”期^②。《明词史》属于断代史，其所谓“中兴”，是就有明一代而言的。李康化先生《明清之际江南词学思想研究》则突破朝代界线，观察明清之际词学思想的演进历程，通过词人、词选、词评三个方面的考察，认为“词学中兴始于嘉靖”^③。

最先打破朝代界线，以词人数量及其作品为依据，认识词坛中兴的起始时间的，当推清初邹祗谟与王士禛。清顺治十七年（1660），邹、王合选的《倚声初集》初刊问世。该集所选词人词作的时段为明万历（1573—1620）至顺治十七年，其宗旨既在于存词立说，又在于揭示这一时期词坛的中兴之盛，即邹祗谟《倚声初集序》所说：自万历以来，词坛“为体与数与人，仿佛乎两宋之盛”^④。今人饶宗颐先生亦持有类似的想法，认为词坛中兴之旅始于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页。

② 张仲谋《明词史》，第120—121页。

③ 李康化《明清之际江南词学思想研究》，第6页。

④ 《倚声初集序》，邹祗谟、王士禛《倚声初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729册，第167页。